

王水照 主編

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

氣與士風

唐宋古文的進程與背景

Soejima Ichiro

副島一郎 / 著

副島一郎 1964年生，日本大阪府人。畢業于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科，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前期課程修了，同博士後期課程滿期退學。曾在中國復旦大學留學，師從王運熙教授。曾任名古屋外國語大學中國語學科講師、副教授，現任同志社大學環球與地域文化學院教授。主要論著：《日本江戶時代中國文章論的接受及其展開》、《范仲淹的學問及其振興文教主張中的道教因素》、《六朝詩人群像》（合著）等。



王水照 主編

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

氣與士風

唐宋古文的進程與背景

副島一郎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氣與士風：唐宋古文的進程與背景／(日)副島一郎著；王宜瑗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0
(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
ISBN 978-7-5325-6938-0

I. ①氣… II. ①副… ②王… III. ①古文運動—中國—唐宋時期—文集 IV. ①I207.6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68651 號

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

氣與士風

——唐宋古文的進程與背景

[日]副島一郎 著

王宜瑗 譯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常熟市華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8.25 插頁 5 字數 182,000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

ISBN 978-7-5325-6938-0

I·2710 定價：29.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前 言

王水照

這套《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由六位日本中青年學者的論文集所組成，他們是（依姓氏筆劃排列）：內山精也《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東英寿《復古與創新——歐陽修散文與古文復興》；保荊佳昭《新興與傳統——蘇軾詞論述》；高津孝《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淺見洋二《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副島一郎《氣與士風——唐宋古文的進程與背景》。他們的論文大都從“宋學”、尤其側重于宋代文學方面展開，代表彼邦富有活力的研究力量，反映了最為切近的學術動態，值得向我國學界同道譯介推薦。

“宋學”在我國經學史上原是與“漢學”相對舉的學術概念，簡言之，即是指區別于考據之學的義理之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經部總敘》云：清初經學“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與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就是一場學術紛爭夾雜門戶之見的有名論爭。現代學者則把此語用作中國思想史上宋代“新儒家學派”的總稱。鄧廣銘《略談宋學》一文即“把萌興于唐代後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國以後的那個新儒家學派稱之為宋學”，而“理學”僅是宋學中衍生出來的一個支派，與“宋

學”不能等同(《鄧廣銘治史叢稿》第164—165頁)。而陳寅恪則從中國學術文化史的角度立論,將它視作宋代學術文化的同義語。他在論述“新宋學”時指出:“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熏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5頁)這裏的“新宋學”明確包括“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各種領域,而“新宋學”之于“宋學”,只是學術觀念的更迭出新,兩者的涵蓋面應是相同的,均指宋代整個學術文化。

“宋學”的上述三個界定,分別指向特定的對象和領域,各具學術內涵和意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們這套叢書命名中所說的“宋學”,乃采用第三個界定,即指宋代整個學術文化。學術研究本來就有綜合與分析或曰宏觀與微觀的不同方法和視角,尤重在兩者內在的結合與統一,力求走向更高層次的綜合,獲得宏通的科學認識。研究宋代學術的每一個部類,總離不開對整個社會的認識與把握。因為社會是一個有機整體,其構成中的每一個部類不能不受制於整體發展變化的狀況,各個部類之間又不能不產生無法分割的種種關聯。而說到對宋代社會的宏觀認識和整體把握,又不能不提到八十多年前輩聲學界的“宋代近世說”的舊命題,對這個舊命題的系統檢驗和反思,對其含而未發的意蘊的探求,需要我們把這個老題目繼續做深做透。這對宋代學術研究格局的拓展和深化,似乎還沒有失去它的價值。

日本京都學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內藤湖南(1866—1934)提出了著名的宋代近世說,構想了以唐宋轉型論為核心的完整的宋史觀。根據他在大正九年(1920)于京都帝國大學的第

二回講義筆記修訂而成的《中國近世史》，開宗明義就說：“中國的近世應該從什麼時候算起，自來都是按朝代來劃分時代，這種方法雖然方便，但從史學角度來看未必正確。從史學角度來看，所謂近世，不是單純地指年數上與當代相近而言，而必須要具有形成近世的内容。”他正確指出歷史分期中的“近世”不能照搬王朝序列，也不能單純按照距離當前的較“近”的年數計算，而應抓住“近世的内容”。而所謂“近世的内容”，就是其第一章“近世史的意義”所列出的八個子目：“貴族政治的衰微與君主獨裁政治的代興；君主地位的變化；君主權力的確立；人民地位的變化；官吏任用法的變化；朋黨性質的變化；經濟上的變化；文化性質的變化”，這八種變化覆蓋了政治、經濟、文化三大領域，是全社會結構性的整體變動（譯自《內藤湖南全集》第十卷，亦可參見內藤湖南著、夏應元等譯《中國史通論》上册第 315 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 年，譯文有小異）。

嗣後，他又發表了著名論文《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和《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這兩篇論文，被宮崎市定斷為構成內藤史學中“宋代近世說”的“基礎”性作品。前文發表於《歷史與地理》第九卷第五號（1922 年 5 月），對他的宋代觀做了一次集中而概括的表述，指出唐宋之交在社會各方面都出現了劃時代的變化：貴族勢力入宋以後趨於沒落，代之以君主獨裁下的庶民實力的上升；經濟上也是貨幣經濟大為發展而取代實物交換；文化方面也從訓詁之學而進入自由思考的時代。後文發表於《支那》（1928 年 10 月），著重論述宋代以後的文化逐漸擺脫中世舊習的生活樣式，形成了獨創的、平民化的新風氣，達到極高的程度，因而直至清代末期中國文化維持著與歐美相比毫不遜色的水準（參見宮崎市定《自跋集——東洋史七

十年》第九“五代宋初”，岩波書店 1996 年）。

內藤氏的這一重要觀點，曾受到當時東京學派的質疑與駁難，但爭論的結果，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唐宋之間存在一個“大轉折”，雖然依然否定宋代近世說。然而在日本史學界中，內藤氏的觀點仍然保持著生命力，影響深巨。尤其是他的門生宮崎市定（1901—1995）的有力支持。宮崎氏原先對這一觀點也抱有懷疑，經過認真的思考和研究，轉而不遺餘力地宣傳和證成師說，從多個學術專題上展開深入而具體的論證，成為乃師學說的“護法神”。他在 1965 年 10 月發表的《內藤湖南與支那學》一文（《中央公論》第 936 期，收入宮崎市定著《亞洲史研究》第五卷，同朋舍）指出，“（內藤）湖南留給後代的最大的影響是關於中國史的時代區分論”，以往日本學者也有把宋代以後視為“新時代”的開始的，“但是湖南則完全著眼於中國社會的全部的各種現象，尤其是社會構成和文化由唐到宋之間發生了巨大變化的這一事實”，從而確認“宋代以後為近世”的這一判斷。作為建樹了傑出業績的宋史研究專家，宮崎市定明確宣稱：“我的宋代史研究是以內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說為基礎的”，他的研究正是以內藤氏的這一學說為“基礎”而展開的。他首先注意經濟、財政、科技等問題，認為“宋代近世說的依據在於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古代交換經濟從迄於前代的中世性的停滯之中冒了出來，出現了令人矚目的復活”。並進而指出宋代已由“武力國家”轉變為“財政國家”，財力成為“國家的根幹”，甚至湧現出新型的“財政官僚”（均引自《自跋集——東洋史七十年》第九“五代宋初”）。宮崎氏的宋史研究範圍廣泛，內涵豐富，舉凡政治史（《北宋史概說》、《南宋政治史概說》）、制度史（《以胥吏的陪備為中心——中國官吏生活的一個側面》、《宋代州縣制度的由來及其特色》、《宋代官制序

說》)、教育史(《宋代的太學生活》)、思想史(《宋學的論理》)均有涉足,成績斐然。至於他的《宋代的石碳與鐵》、《支那的鐵》兩文,澄清了“認為中國人本來就缺乏科學才能,長期陷於落後的狀態”這一“誤解”,肯定“宋代所達到的技術革新具有世界史上的重要性”,突出了宋代在科技史上的重要地位。

內藤、宮崎等人的宋代近世說,以唐宋之際“轉型論”為核心,又自然推導出“宋代文化頂峰論”和“自宋至清千年一脈論”。

內藤氏在逐一推闡唐宋之際的種種變革時,衷心肯定其歷史首創性,其內在的思想基準是東亞文明本位論,即認為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東亞文化發展程度“非常高”,比歐美文化高出一籌,而這個中國文化主要即是自宋至清的中國近世文化。宮崎市定的觀點就更為鮮明,態度更為堅決了。他的《東洋的文藝復興與西洋的文藝復興》一文(原載於《史林》第二十五卷第四號 1940 年 10 月、第二十六卷第一號 1941 年 2 月。後收入《亞洲史研究》第二卷,《宮崎市定全集》十九卷),首次提出了“宋代文藝復興說”;而《宋元的文化世界第一》一文(原載於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宋元的美術》1980 年 7 月,收入《宮崎市定全集》十二卷),文章的題目已猶如黃鐘之音、警世之幟。他寫道:“宋元這個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是稀有的偉大的時代,是民族主義極度昂揚的時代。代之以軍事上的萎靡不振,中國人民的意氣全部傾注於經濟、文化之上,並加以發揚,取得了出色的成果。”他對宋代文化的推重,從中國第一到“世界第一”,真是無以復加了。

內藤氏的唐宋轉型論確認宋代進入近世,君主獨裁政治形成並趨於成熟,平民地位有所提高;還進一步確認,這一歷史趨勢的持續發展,必然走向清末以後“共和制”的道路。這

就把宋代和當下(清末民初)連貫起來作歷史考察。宮崎市定繼續發揮這一“千年一脈論”：“據湖南的觀點，在宋代所形成的中國的新文化，一直存續到現代。換言之，宋代人的文化生活與清朝末年的文化生活幾乎沒有變化。由於宋代文化如此的發展，因而把宋代後的時期命名為近世。……認為宋代文化持續到現代中國，是他的時代區分論的一大特點”。這裏既指明宋代社會與清末當下社會的內在延續性，也為“近世”說提供時間限定的根據(《內藤湖南與支那學》)。

內藤氏的宋代近世說，以唐宋轉型或曰變革為核心內容，從橫向上突出宋代文化或文明的高度成就，從縱向上追尋當下社會的歷史淵源，體現了對歷史首創性的尊重，對歷史承續性的觀察，體現了東方文化本位的思想立場，構成了完整的宋史觀。

當我們把目光從東瀛轉向本土的學術界，就會饒有興趣地發現一種桴鼓相應、異口同聲的景象。我國一大批碩儒耆宿相繼發表眾多論說，與內藤氏竟然驚人一致。他們中有的與內藤其人其書容有學術因緣，而絕大多數學者卻尚無法指證受其影響，這種一致性更加使人驚異了。

首先是“轉型論”。陳寅恪於1954年發表《論韓愈》一文，認為韓愈是“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啓後轉舊為新關鍵點之人物”，即“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開啓趙宋以降之新局面”。他雖未涉及“上古”、“中世”、“近世”之類西方現代史學的分期名詞，但這個確認此時為新舊轉型的大判斷，是不容他人置疑的。呂思勉的《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一章有言：“吾嘗言有唐中葉，為風氣轉變之會”，“唐中葉後新開之文化，固與宋當畫為一期者也。”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第十六章即題為“唐宋間社會之變遷”，認為“自唐室中晚以降，為吾國中世紀變化

最大之時期。前此猶多古風，後則別成一種社會”。“宋代近世說”在這兩位史家筆下，已經呼之欲出。胡適作為現代學術開風氣的人物，就直截了當用嶄新語言宣稱：從“西元一千年（北宋初期）開始，一直到現在”，是“現代階段”或“中國文藝復興階段”或“中國的‘革新世紀’”（《胡適口述自傳》第 295 頁，華文出版社 1989 年）。這裏的“現代階段”實與內藤氏的“近代階段”含義相通，“文藝復興階段”則與宮崎氏用語完全一致，至于“革新世紀”更是踵事增華，近乎標榜之語了。

視宋代文化為中國歷史之最，這一觀點在中國史學界也成常識。表述突出、頗顯恢宏氣度的是陳寅恪為鄧廣銘著作所作的序和鄧氏的一篇史學論文。陳寅恪作于 1943 年的《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云：“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而鄧廣銘在 1986 年寫的《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宣告：“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陳氏還只說趙宋文化是“空前”，鄧氏更加上“絕後”，推崇可謂備至。比較而言，王國維顯得頗為謹慎，他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宋代之金石學》，《王國維遺書》第五冊《靜安文集續編》第 70 頁，上海書店 1983 年）他肯定兩宋文明前超漢唐，後勝元明，清代略而不論，當有深意存焉。胡適于 1920 年與諸橋轍次的筆談中，從中國思想史的角度提出：“宋代承唐代之後，其時印度思想已過‘輸入’之時期，而入于‘自己創造’之時期”，“當此之時，儒學吸收佛道二教之貢獻，以成中興之業，故開一燦爛之時代。”（見《東瀛遺墨》第 154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至于研究宋代和當下社會之間的聯繫，也是中國學者關注的重點。與內藤氏有過直接交往的嚴復，面對民國初年紛爭頻仍、國勢不寧的局勢，也從歷史資源中探尋救治之道。他說：“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爲今日現象者，爲善爲惡，姑不具論，而爲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致熊純如函》，《學衡雜誌》第13期）錢穆在致一位歷史學家的信函中，也同樣強調宋代研究對於當下現實有著特殊的意義與價值，應注重近千年來在社會、經濟、文化形態上的種種聯結點。

簡略梳理中日學術史上“內藤命題”的相關材料，可以看到這個命題獲得範圍深廣的回應，吸引衆多一流學者直接或間接的參與，形成一場集體的對話，豐富了命題的內涵，使之成爲一個蘊藏無數學術生長點、富有學術生命力的課題。這首先由於內藤氏“是立足於中國史的內部，從中引出對中國歷史發展動向的認識”，而不是單純憑藉“從外部引入的理論”來套中國史實；同時又能“把中國史全部過程，作整體性的觀察”，避免了“不能從整體上把握中國史的缺陷”（谷川道雄《致中國讀者》，見內藤湖南著、夏應元等譯《中國史通論》）。谷川氏的這一概括，準確地抓住了“內藤命題”所包含的學術方法論上的兩大精神實質。

其次是命題的開放性。歐美史學界把內藤氏的宋代近世說稱之爲“內藤假說”（Naito Hypothesis），就是說其真理性尚待驗證、補充，並非不可動搖的金科玉律，更不是可以照搬照套的“指導原則”。事實上，內藤氏提出此說以及中國學者的相關述說，大都是基於他們深厚中國史學功底的大判斷、大概括，還未及作出細緻的論證和具體的展開（宮崎氏是個例外）。而“上古、中世、近世”的這套西方史學分期方法如何與“歷史

決定論”或“歷史目的論”劃清界綫；宋代文化頂峰論能否成立，是否應有限定；宋代和清末民初社會之間千年一脈的歷史紐帶，也需作出有理有據的揭示，這些都有待後人的繼續探討。

然而，我們重提“內藤命題”，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僅僅爲了求證“宋代近世說”的正確與否，其個別結論和具體分析能否成立，而主要著眼於學科建設的推進與發展。一門成熟的學科，既要有個案的細部描述與辨析，更需要整體性的宏觀敘事，其中應蘊含有一種貫穿融會的學理建構，即通常所說的對規律性的探索。由於對“以論帶史”、“以論代史”學風的厭惡，“規律性”、“宏觀研究”的名聲不佳，甚至引起根本性的懷疑。但不能設想，單靠一個個具體的實證研究，就能提升一門學科的整體水平。綱舉纔能目張，“內藤命題”關心宋代社會的歷史定位，關心其時代特質，關心社會各個領域的新質變化等等，就爲宋代研究提供了這樣一個“綱”。

收入這套叢書的六個集子，並非以宋代的整個學術文化爲論題，也不徑直宣稱以“宋代近世說”爲指導原則，但我們仍可看出在研究思路上的傳承和嬗變，學術精神上的銜接和對話。比如，淺見洋二的書名即標示出“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副島一郎在《後記》中敘說他的《唐代中期的貨幣論》一文寫作的潛在學術淵源，即是顯例；而體現在他們各篇論證具體問題的論文中的宋史觀，則有更多的耐人尋味之處。如果說宮崎市定的宋學論文，論題廣泛而偏重於經濟、制度層面，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日本史學走向的話，那麼這套六人集卻多從文學層面落筆，而又突出“士大夫”即宋代文化的主要創造主體而展開，這在內山精也、淺見洋二、副島一郎等人的論文中均有著重的表現，而有的書名更明確揭示了“士大夫”或“士人社

會”是他們的論述基點。宋代以來，以進士及第者為中心的“士大夫”階層，取代六朝隋唐的門閥士族，而成為政治、法律、經濟決策和文化創造的主體，這本身就是中國社會“唐宋轉型”的一大成果，也是認宋代為“近世”的主要依據之一，而所謂“自宋至清千年一脈論”，在很大程度上也基於對這個特殊階層之存在的體認。更重要的是，當“內藤命題”從經濟史、制度史向思想史、文藝史領域延伸時，“士大夫”作為創造主體的地位就尤其顯著。據我所知，1999年3月21日，日本的宋史研究者曾在東京大學文學部召開一次專題討論會，名為“宋史研究者所見的中國研究之課題——士大夫、讀書人、文人或精英”，會議的主題就是呼喚以“士大夫”為中心的研究。自此以後，他們陸續在此課題上結集發表研究成果，如1999年勉誠出版《亞細亞游學》7號特集《宋代知識人之諸相》、2001年勉誠出版《知識人之諸相——以中國宋代為基點》等。這確實可以說反映了日本學術界的一個研究動向。

由于抓住了士大夫社會的特點，以及印刷技術作為新興的傳播媒體給這個社會帶來的巨大現代性，使內山精也從看似平常的題目中發掘出了豐富而嶄新的意蘊。他論王安石《明妃曲》、蘇軾“烏臺詩案”和“廬山真面目”等文，吸納融會接受美學、傳播學等理論成果，描述宋代士大夫的心態和審美趨向，讀來既感厚重而又興味盎然。淺見洋二的《距離與想象》一書論題集中，他立足於對中國詩學史的總體把握和對批評術語的特有敏感，從一系列詩學的或與詩學相關的命題中，細緻地推考和論證“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令人頗獲啟迪。所謂“唐宋轉型”，實際上從唐中葉起就初顯徵兆，與中唐樞紐論異名同義。副島一郎即選取自中唐至北宋這一歷史時段切入論題，對啖助、杜佑、柳宗元至宋初古文家、易學家進行探討，

舉證充分，結論平實可據。當然，經濟、制度等選題仍然受到學者的注意，尤其是宋代以來成熟的科舉制度，對士大夫社會的作用可謂舉足輕重，高津孝就有多篇論文涉及科舉與文學的關係，並有新的創獲。保荊佳昭、東英寿兩位則專注于作家個案研究，分別以蘇軾詞和歐陽修古文為論題，曾引起中國同道的矚目。高津孝、保荊佳昭、東英寿三人都長于史實、文獻的考辨，發揚了日本漢學長期形成的優良傳統。高津孝對於古文八大家的成立過程的系統梳理，其結論引用率甚高；保荊佳昭對蘇軾詞的意象分析和編年考證，也顯出頗深的文史功底；東英寿對歐陽修文集版本的考察，亦稱縝密細緻，尤對日本尊為“國寶”的天理圖書館藏本作了迄今所見最為詳盡的考評，認定其版本價值居現存歐集諸本之首，殆成定讞。

我和這六位作者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學緣關係，有的相識已達二十年之久。早在1990年，一批年輕的宋代文學研究者就在早稻田大學“宋詩研究班”的基礎上，成立了“宋代詩文研究會”，自那以來，他們組織了富有成效的研究，迄今為止，舉辦了八次專題討論會，編輯了十二期《橄欖》雜誌，完成並出版了錢鍾書先生《宋詩選注》的日譯。而這六位作者，都是“宋代詩文研究會”的活躍成員。如今，他們年富春秋，屬於日語所謂的“四十代”，學術事業正如日中天，未可限量。祝願他們精進不止，繼續貢獻學術精品；同時盼望其他的日本學人來加盟這一宋學研究的群體，共謀學術發展。

目 錄

前言 王水照 /1

宋人眼裏的柳宗元 /1

宋人與柳宗元的思想 /44

《通典》的史學與柳宗元 /62

從“禮樂”到“仁義”——中唐儒學的演變及其背景 /81

唐代中期的貨幣論 /101

唐宋古文中的“氣”論與“雄健”之風 /117

宋初的古文和士風——以張詠爲中心 /144

宋初的易學者與古文家——從陳搏到馮元 /178

孟姜女故事·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長城詩 /224

空梁落燕泥——薛道衡死因臆說 /238

各篇日文原題與最初發表書刊 /243

後記 /244

宋人眼裏的柳宗元

前 言

在論述唐與宋的古文復興之關係時，往往側重於宋人與韓愈的關係之上。如果從韓愈被視為道統與文統的最正統的繼承者這一點上看，這種側重無疑是正確的。不過，對於唐代古文的另一重鎮——柳宗元與宋人的關係，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迄今為止的研究都認為宋初人推崇韓愈而忽視柳宗元，崇韓抑柳的既定觀念籠罩了整個兩宋文壇^①。但實際狀況並不如此單純。拙稿將試圖探討柳宗元的古文是如何被宋人解讀，對宋代古文又發生過怎樣的影響。

上篇 對柳文風格的評價 與柳文的影響

一、宋初對柳宗元的總體評價

儘管宋代古文的顯著特徵之一是向唐代古文尋求楷模或

^①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三冊第47、第5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祖型^①，但是唐與宋的古文風格迥異，比如早在南宋時羅大經就指出唐宋的差異：“韓柳猶用奇字重字，歐蘇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鶴林玉露》甲編卷五“韓柳歐蘇”條）王水照先生也曾指出，作為文學運動本身，宋代古文運動是文風的改革，有意選擇韓愈風格中通達流暢的一面而加以繼承發展^②。那麼韓愈之外，柳宗元對宋代古文產生過什麼影響，宋人又是怎樣看待柳文的？

宋初古文提倡者的言論中雖然找不到有關柳宗元的具體評論，但總體評價都相當高。比如柳開（947—1000）“少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肩愈，字紹先”（《宋史·柳開傳》），他自己解釋改名更字的理由是：“謂其肩，斯樂古道也；謂其紹，斯尚祖德也。退之大於子厚，故以名焉；子厚次之，故以字焉。”（《東郊野夫傳》）對韓柳都同樣尊崇。雖然柳開從道統觀念的角度，把柳宗元置於韓愈之次：“或問退之子厚之優劣，野夫曰：文近道不同。或人不諭。野夫曰：吾祖多釋氏，于以不殆韓也”（同上）。不過“文近道不同”，反過來也就是說“道”雖不同而“文近”，就文章本身而言，韓柳並沒有高低之別，所以柳開又曾說：“其言文之最者，曰元韓柳陸也。”（《答梁拾遺改名書》）

另一位古文復興的倡導者王禹偁（954—1001）也曾說：“近世為古文之主，韓吏部而已。”（《答張扶書》）並主張應該繼承韓文的通達流暢；但同時也經常韓柳並稱，如“今攜文而來者，吾悉曰韓柳也”（《答鄭褒書》）、“會有以生（孫何）之編集惠余者，凡數十篇，皆師戴六經排斥百氏，落落然真韓柳之徒也”

①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第320頁（上海書店《民國叢書》本）。

② 《宋代散文的風格》（收入《唐宋散文論集》，齊魯書社）。